

# 探路之役

1978 ~ 1992 年的  
中国经济改革

改革  
开放  
研究  
丛书

萧冬连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改革  
开放  
研究  
丛书

# 探路之役

---

1978 ~ 1992 年的  
中国经济改革

萧冬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 萧冬连  
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6974 - 4

I. ①探… II. ①萧…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改革 -  
研究 - 1978 - 1992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3791 号

·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

探路之役：1978 ~ 1992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

著 者 / 萧冬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9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974 - 4

定 价 / 7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前 言 .....	i
<b>第一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b>	<b>001</b>
一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	001
二 改革的经济动因 .....	005
三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	008
四 扩大引进：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	012
五 出国考察潮：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	018
六 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023
<b>第二章 从放权、让利和松绑起步 .....</b>	<b>029</b>
一 对农民让利与松绑 .....	030
二 扩大企业自主权 .....	034
三 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 .....	041
四 从扩权到以税代利 .....	045

	五 国营企业的改组和联合 .....	050
	六 城镇集体（合作）个体（私人）经济的恢复 .....	054
<b>第三章</b>	<b>国门是如何打开的 .....</b>	<b>063</b>
	一 “大引进”遭遇瓶颈 .....	063
	二 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	068
	三 外商如何进入中国 .....	071
	四 经济特区的决策与筹建 .....	077
	五 充满挑战和争议的试验 .....	084
	六 对外开放再起热潮 .....	091
<b>第四章</b>	<b>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b>	<b>095</b>
	一 包产到户在争论中兴起 .....	095
	二 政策是怎么被突破的 .....	103
	三 覆盖全国的农村大变革 .....	108
	四 农村经济超常增长的诸因素 .....	114
	五 农村改革释放出市场能量 .....	116
	六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 .....	120
<b>第五章</b>	<b>“商品经济”：第一个重大突破 .....</b>	<b>125</b>
	一 计划与市场：最初模板及其讨论 .....	125
	二 在中外交流中开拓思路 .....	132
	三 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的争论 .....	138
	四 改革理论探索未有止步 .....	146
	五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	151
<b>第六章</b>	<b>启动城市改革 .....</b>	<b>159</b>
	一 价格双轨制形成 .....	160
	二 取消统派购制度 .....	167

三	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	171
四	遭遇总需求膨胀 .....	176
五	四次省长会议 .....	180
六	巴山轮会议：目标与过渡 .....	183
七	“七五”计划建议的新认识 .....	188
<b>第七章</b>	<b>改革的路径选择 .....</b>	<b>190</b>
一	整体推进还是局部试验 .....	190
二	“价、税、财联动”方案的设计 .....	195
三	“价、税、财联动”方案为什么搁浅 .....	198
四	从“软着陆”到再度“起飞” .....	201
五	转向全面承包制 .....	205
六	股份制及其他试点 .....	212
七	宽松环境是否可期 .....	215
八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改革正名 .....	219
<b>第八章</b>	<b>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b>	<b>224</b>
一	年初的方针：稳定经济与沿海战略 .....	224
二	为什么转向价格闯关 .....	230
三	“闯关”受阻及其检讨 .....	237
四	三年治理整顿：成就与代价 .....	243
五	治理整顿期间的改革开放 .....	249
<b>第九章</b>	<b>“市场经济”：越过临界点 .....</b>	<b>258</b>
一	姓“社”姓“资”的争论 .....	258
二	1991年：在激辩中酝酿突破 .....	263
三	邓小平南方谈话 .....	269
四	中共十四大的突破 .....	276
五	市场化转轨已过临界点 .....	280

第十章	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	287
一	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起始条件·····	288
二	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290
三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释放出市场力量·····	294
四	开放推动了改革·····	298
五	地方政府的作用·····	300
六	开放的决策机制·····	305

## 前 言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 40 年。40 年改革的阶段如何划分尚无定说，但无论如何划分，1978 ~ 1992 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我把这一时期的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正是经历了这 15 年的探索包括激烈争论，中国改革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解读 1978 ~ 1992 年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问题意识：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了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独中国一家。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启动改革之初，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以及东欧改革经济理论，曾受到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不能有效运行。从 50 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在摸索改良计划经济的出路。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但是始终没有突破。直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所有国家的改革都不算成功。其结局先是无法突破旧体制的硬壳，后是改革失去控制。通过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



渡，没有产生社会失控和经济下滑，并且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只有中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称其为“中国奇迹”，这都是20世纪最后20年最令世界瞩目的大事件。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一直不看好中国改革。直到199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还写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改革也将近10年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和灾难性失败的混合体。”<sup>①</sup>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巨大反差逐步转变了西方舆论。继续看衰中国改革前景的观点始终存在，但更多的学者对探讨中国改革经验产生了兴趣。据经济学家张军介绍，1994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转型国家》的论文集，主编Reisen和Lee在导言中写道：“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家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转型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出现的反应之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sup>②</sup>

中国是如何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的呢？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着重于改革方式，认为东欧国家及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通过不断的局部试验逐步推进，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并存的过渡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第二种解释与此相反，强调中国启动改革时，存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粗糙的计划体制等，这些因素有

① 转引自张维迎、易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景维民主编《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第310页。

② 张军：《中国经济转型30年经验贡献了什么》，《科技与经济画报》2008年第5期。

利于市场化转轨和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因而渐进式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sup>①</sup> 第三种解释强调地区竞争的意义。财政分权造成地区之间的竞争，而地区竞争对于促进计划体制的解构和市场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第四种解释强调市场化演进的自发性，认为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无形之手的控制下进行的追求利益的过程，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sup>②</sup> 中国市场化转型是一场“边缘革命”，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sup>③</sup> 这些解释给人以启发，但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也许它们各自说对了一个方面的事实，实际的演进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国内，回顾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有影响的观点不是产生在党史、国史学界，而是其他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经参与过历史进程。同样应当受到特别关注的，还有参与决策和践行改革的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提供的情况和看法。几年前，我有机会参与一个改革口述史项目，采访了几十位改革参与者，如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陈清泰，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珠海市委原书记梁广大，海南省原省长雷宇，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计委司长宋晓梧，原体改委局长杨启先、杜岩、江春泽、谢明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部长乔刚，原国务院特区办司长林其辉，经济学家吴敬琏、赵人伟、冯兰瑞、王小鲁及翁永曦、张木生、孙方明等，了解了一些当时决策的背景和内幕，这对我理解改革的复杂性有很大帮助，它与单纯的文本解读是不同的。不过，我的研究主要的还是阅读，

---

① 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2003年7月。

② 张维迎、易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景维民主编《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第310页。

③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

不是采访。如阅读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杨启先、房维中、张卓元、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的回忆和研究作品，为我们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分歧的实质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当然，不同人对80年代的解读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不只是对改革总体策略的评价，甚至对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都不一样，例如对于究竟谁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策略的发明者，就争论不休。历史学者不必评论谁是谁非，但应关注这种争论。本书关注的重点是那些进入决策咨询和对决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资料，一般不涉及纯理论性讨论；资料的引用以说明问题为旨归，不代表对作者的评价。当然，在中国，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不是单纯用经济逻辑能够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演进受到政治、社会、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当有更广阔的视野。

历史学者参与到改革开放史研究，首先不是提供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应当厘清历史事实，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历史研究追求还原真相，真正还原不容易。有人把历史真相区分为事件真相与逻辑真相，我以为有道理。真正好的研究，应当探究事件背后的逻辑，它的前因后果，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做大事记式的记录，看不到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历史的复杂性，这样才能给人一种历史智慧。本书对历史进程的梳理，以高层决策为主线考察一系列互动过程，诸如中央决策与地方试验的相互推动、实践突破与政策引导的相互推动、理论界的讨论如何影响决策、借鉴国外经验如何适应中国实际，以及高层在一系列重大决策问题上是怎样化解分歧取得共识的，等等。如果能通过这种考察展示80年代改革的一些特点，或者能为读者理解80年代改革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和一些基本史实，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 第一章

#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人们一般称 1978 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 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以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发一场集体性反思。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从 1977 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 1978 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分歧，华国锋的态度是积极的。依当时的情势，无论谁在台上，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革”，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 一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中国改革何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我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革”后，改革

的因子已经在“文革”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诡谲的党内权争，“文革”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革”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革”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不少人在80年代的改革中崭露头角。

不只是年轻人，还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的，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九一三”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革”路线，“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sup>①</sup>“文革”聚集了否定“文革”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革”、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革”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解放。就如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农村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

<sup>①</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第1781~1782页。

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革”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文革”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革”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革”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sup>①</sup>“文革”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程，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纠正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纠正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131、1244～1245页。

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sup>①</sup>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sup>②</sup> 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sup>③</sup> 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作为这种思路的体现，1977年、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如薛暮桥1978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薛暮桥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看法：现在的管理体制的根本缺点是，不管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却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没有外汇，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花了八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在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

① 参见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② 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

③ 林子力访谈录，见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379页。

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sup>①</sup>薛暮桥认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规律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sup>②</sup>

拨乱反正不止于回到“文革”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sup>③</sup>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自己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sup>④</sup>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人的思想解放，就是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作先导，经济改革不可能推动。

## 二 改革的经济动因

“文革”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1977年2月12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1974年、1976两年停滞不前，1976年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五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三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sup>⑤</sup>有人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

① 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

② 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

③ 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

④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34页。

⑤ 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未刊稿，第13页。



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崩溃边缘”的说法首次出现。

对于“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著名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如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1952年至1975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却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持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sup>①</sup>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说明在“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sup>②</sup>尽管不少人对统计数据存有疑问，我仍愿相信“文革”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革”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局，这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当时的资料，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如安徽省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

① 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7期，1996年春季。

② 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